

十七世纪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  
而复社的兴起和发展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  
将复社置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其发展、影响  
及相关问题

# 复社与明末清初 政治学术流变

王恩俊 著

2013 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 复社与明末清初 政治学术流变

王恩俊 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恩俊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社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流变/王恩俊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05-07765-5

I. ①复… II. ①王… III. ①复社—研究 IV.  
①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4216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3

插 页: 1

字 数: 31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伯 灵

装帧设计: 杨 勇

责任校对: 张 洁

书 号: ISBN 978-7-205-07765-5

---

定 价: 40.00元

# 编 委 会

主 任

杨路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红君 尹伟达 田立坤

张 洪 李 红 陈 涛

金 虎 贺 伟 高永民

## 总 序

杨路平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瞻远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谋划部署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推动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需要加大对社会科学工作的支持力度，需要鼓励潜心研究、扎实做学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需要积极营造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实现这一目标，2012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首次资助出版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科学普及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管理、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又有研究时代楷模郭明义的著作；既有涉猎文化强省建设问题，又有涉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既有历史学，又有文学、考古学、美学；既有新闻学，又有教育学。这些著作体现了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的求实精神。这次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优秀作品，对于繁荣学术、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宣传和推介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研究辽宁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鼓励专家学者服务社会，不断提高辽宁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辽宁省社科联资助出版优秀社会科学专著工作，会进一步激发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会进一步引导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加强辽宁全面振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会有一大批全面阐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优秀成果面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2013年8月

## 序

这部洋洋 30 万言，厚重而坚实的学术著作，是王恩俊博士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近 7 年的沉淀、思索、充实、修改而成，即将付梓行世，真乃可喜可贺。

王恩俊读书刻苦、勤于思索、经年积累、终有成就。应邀为《复社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流变》撰写序言，使我有幸通读这部书稿并写出以下文字。

第一，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其学术史，这一点至关重要。王恩俊将复社及明季文人社盟研究之学术史分国内和国外研究两部分进行梳理。国内研究状况分四个时期，即清初至 20 世纪初，20 世纪初至 50 年代，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都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精神特色的烙印。清人的研究以张鉴《冬青馆集》中多篇文章为代表，粗略交待了复社几种名录的收藏流传及复社活动的基本情形，结论则是“明以党争亡国，社盟实助之”，对复社进行挾伐。20 世纪初至 50 年代是复社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共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以容肇祖《论复社》、刘元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要略》、贺岳憎《论明末党社运动》和胡怀琛《中国文社的性质》影响为大。胡怀琛将复社归类为乱世文社，认为其与历史上在野者的清议密切相关，士人以讲学为名，提倡声气，裁量人物，群起应合，虽为当朝者所厌恶，却也无如之何。清末民初，时代变迁，民族、民主思潮勃兴，人们对复社成员的抗清言行和讽议朝政的社会责任感的表达进行了新的诠释。甚至有人将复社视为近代政党的萌芽。这一时期的论文以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和《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等 3 篇影响最大。郭先生对明代文人结社的基本情况、结社分期、结社特点以及对文学的影响作了深入论述。这一时期的著作，以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朱棣《明季社党研究》最为学界称道。谢先生的著

作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研究的奠基之作。先生道：“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作者撰写此书之目的在于“唤起民族精神”。与谢著不同，朱著《明季社党研究》注重细节考证，对明季社党之发起、流变、成员姓氏事迹等多有考订，学术价值很高。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研究论文不多，学术著作有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和蒋逸雪的《张溥年谱》。朱著是复社名士陈子龙的传记体学术专著，特色鲜明。蒋著《张溥年谱》以张溥一生活动的实践为经，将复社重要活动及其成员间交往排列起来，考订讹误，重缀复社成员姓氏，并加注案语，为深入研究提供线索。在此期间，台湾学者胡东原发表了数篇论文，讨论复社与反清运动及清代学术的关系，将复社研究引向深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文章不过10篇，学术专著有3种。陈宝良的《中国的社与会》，对中国历史上各种会社组织进行研究，尤对文人党社组织用功最多，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者颇有借鉴意义。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后又出版《续篇》实为两部著作）将复社作为重要个案，探讨了复社兴起的原因、形成过程、学术思想及文学创作，而以复社成员文学创作及影响着墨最多。除上述几部专著外，《柳如是别传》、《南明政争之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南明史》（顾诚、南炳文、钱海岳各著一部）等著作之相关篇章也有对复社或复社成员的不同角度的考察。

国外学者有关复社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在王恩俊的搜求范围之内。主要披阅了宫崎市定、井上进、小野和子等日本学者的《明末的结社运动之考察——以复社为中心》、《张溥及其时代——明末苏州一乡绅的生涯》、《复社之学》、《复社姓氏校录附〈复社记略〉》、《明季党社研究——东林与复社》及美国学者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邓尔麟《科举政治》等著作。阅读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只为掌握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结论，更重要的是借鉴吸纳他们的理论路径和社会史研究方法。

王恩俊对复社这一课题的学术史把握是较全面和准确的。前贤关于此课题研究做了些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做、还有哪些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化？对此了然于胸，便清楚自己的论文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哪里是切入点、哪里是难点。

第二，广泛深入地史料搜求与辨析。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没有翔实丰富的史料，何谈史学研究！王恩俊在史料搜集上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她将有关复社的历史文献分为七类，即专记复社和社事类、正史和实录类、传记类、杂

史野史笔记类、方志类、文集类、诗话类，按图索骥、分类搜求，重点放在专记复社和社事类、方志类和文集类。

专记复社和社事类文献，可分两种。一种是吴扶九辑《复社姓氏录》、吴次尾辑《复社姓氏》、吴铭道《复社姓氏补录》，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吴扶九、吴次尾为复社成员，吴铭道、吴山嘉为吴扶之孙与玄孙，他们所辑文献，是考订复社成员和社中成员个体活动的最主要依据。另一种是吴梅村《复社纪事》、杜登春《社事始末》和陆世仪《复社纪略》。吴梅村、陆世仪为复社名士，杜登春为复社主要成员杜麟征之子，这三部文献史料价值很高，是探讨复社主要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社内组织状况等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陆世仪的《复社纪略》，记载了周之燮、陆文声倾覆社局的情况和阁臣对社事的相关奏议，多为他书所不载。

复社成员数量巨大，分布地域很广，且复社成员多为地方名士，故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学术信息。王恩俊重点披阅了明清（主要是明末清代）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艺文志》和《选举志》，尽量搜索复社成员的相关史料。这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很大的。

文集类文献数量浩大，王恩俊投注了更多的热忱与关注。复社领袖张溥的《七录斋集》、张采的《知畏堂集》、复社名士陈子龙的《陈忠裕集》、吴应箕的《楼山堂集》、吴伟业的《吴梅村全集》、侯方域的《壮悔堂集》、彭燕又的《彭燕又先生文集》、冒襄的《同人集》等是精读文献。而与复社学术意见相对的艾南英的《天佣子集》、朱鹤龄的《愚庵小集》亦属精读文献。复社内部同人，在某些政见和学术观念上是存在分歧的，如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江西籍复社名士罗万藻等人的文集，更要仔细阅读，勾索分歧对立的由来、性质和分歧的实质。

王恩俊用了近4年的时间，阅读野史、笔记75种、文集73种、方志80种，七类文献合计240余种，摘抄了大量资料卡片，为本书的写作做好了文献准备。

第三，在海内外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把复社研究推向新高度。王恩俊在总体把握前贤复社研究学术史和全面搜求有关复社的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复社研究相对薄弱之领域，分“明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文人结社”、“复社的兴起及活动”、“复社成员及社内关系”、“复社与明清之际的政治”和“复社与明末清初学术流变”等五章十五节展开自己的学术论述。总体而言，谋篇布局精当，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史料翔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力作。其中精彩和创见不乏纷呈，这里择其要简介如次。

一是晚明文人结社发达的原因，前贤多有探讨。除帝制时代中国文人喜结“文会”“文社”的传统外，研究多集中于明代文人的生活态度、治学态度、学术风气、结社的实用性和政治性等方面的考量。王思士则重点考察了明中期后政治氛围日渐宽松和学术风气转变，对士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等原因对结社发达的推动作用。她认为，王学的流行是儒学世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书院林立，讲会蔚起，成为士大夫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受心学影响的士人，其生活既不像理学家所要求的那样拘谨刻板，也不像文人所表现得那样狂狷洒脱。他们既追求不朽的功业，也不想放弃潇洒的生活。”此番议论是精彩的。在第一章中，王思俊结的晚明文人结社分布广、规模大、成员构成大众化，类型多样，地域色彩鲜明，受左派王学影响士人追求个性张扬，某些结社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等特色，是可信的。而明代科举竞争之白热化和士人求名之风盛行均是晚明结社发达的诱因。

二是一般研究者多认为应社是复社之前身，而计东在《上太仓吴祭酒书一》中说：“应社之本于拂水山房”，那么复社则发端于拂水山房。而王思俊经过考证指出，瞿纯仁的前拂水山房存续在万历12年至万历25年，范文若所结后拂水山房存续在万历25年至万历33年，应社则杨子常、顾麟士所倡，结社于天启4年，两社地址皆在常熟。除此之外，在成员和组织上并不存在继承关系，故不主张复社发端于拂水山房。复社是在张溥、吴扶九、孙淳等人的斡旋努力下，以应社为基础，吸收其他各文社而结成的知识阶层的松散联盟。虽有盟词，却无严密的组织纪律，难以对盟下各社和其成员进行有效控制，盟下各社联系不多，且经常独立举行集会和选文。复社成立，以崇祯二年的尹山大会为标志。张溥、张采是复社公认的领袖，而一些苏州籍成员在社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地设有社长，由当地著名文人或八股高手担当，各地社盟首领则多为家境富足者。

复社早期几年的活动，更多的是利用乡试和某些特殊机缘举行大型集会和选文，有《国表》多集刊行，似乎复社士人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于举业。自“崇祯六年虎丘大会和国门雅集之后，复社的组织发展及声势均达到极盛，随之引来在朝、在野反对势力的攻击，自此，复社开始被卷入政治斗争”。这种论断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此后，东林遗孤纷纷加入复社并成为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组织刊布了《留都防乱公揭》，使复社卷入政争愈来愈深。王思俊分析指出，在是否传檄天下驱逐阮大铖的问题上，社内分歧严重，当时复社领袖杨廷枢等是不支持的。《留都防乱公揭》以肃清阉党余孽阮大铖为主旨，是东林遗孤的复仇宣言，并不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作者对侯方域积极参与驱阮活动，表面上与阮

似乎保有旧谊，接受阮之要求，到阮寓所后却观剧骂座，搅了阮胡子的好局，写得惟妙惟肖。

三是王思俊认为复社成员多来自于以苏州、常州、松江、杭州、嘉兴、宁波七府为中心的太湖、钱塘江周边的吴越文化圈。复社成员的分布与晚明文化地图基本契合，吴地成员在社内占据核心地位。从复社成员家世分析，构成复社成员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四种人：即东林子弟、世家子弟、地方贤达子弟和无世家可依凭者。其家庭之经济实力、文化素养等决定其成名速度。在复社内部，以血缘、姻亲、师生等伦理关系构成社内关系之基础，而拥有相似背景的成员也比较容易结成相对稳定的交往圈，同一地缘之成员又常常结成讲会、诗社互相唱和，当然复社成员间有的矛盾也很尖锐的。复社成员间互称社弟，在举业、学术和经济上相互提携、相互砥砺。王思俊对复社成员及社内关系的研究，细致扎实，分析较深入，是超越前贤的。

四是王思俊在书稿第四章将崇祯朝复社的主要政治活动概括为“争夺科举利益”“与温体仁的斗争”和“与阉党余孽的斗争”。这些活动能够实行甚至取得成效，其方法是领导成员进行群体抗争、官绅结合参与地方大事、制造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在朝堂高端寻找代言人。这样的分析总结入情入理。没有这些方法和策略，也绝对不会有“遥执朝政”的影响力。

对于清初复社成员的活动，作者没有讨论抗清殉节者的事迹，而把议论的重点放在复社明遗民、复社仕清者和复社成员入清后重拾举业的“两截人”上面，着墨探讨他们的生存模式和苦涩的心路历程。这一章中，王思俊着力讨论了入清后复社成员的政治反思。讨论先从侯方域《朋党论》开始。作者认为，侯方域的主张是，天下之事不可独为，君子在求治的过程中必然交往密切，进而出现结党现象。小人之间则常因利益冲突而互相攻击，没有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常呈现孤立无援的态势。对君主来说，更希望看到大臣互相攻击，以便从中控驭。在专制政治中，党争双方不取决于争论之是非，而决定于君主之好恶，故而“小人必胜，君子必败”。黎遂球的《朋党论》则认为党争的根本原因在君主。专制君主从控制大臣的角度出发，希望看到他们互相攻击，进而实现对权利的绝对控制。而夏允彝的《幸存录》则对朋党持否定态度，认为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夏氏虽系复社名士，对东林、复社评价极低，认为他们与阉党一样都是高皇帝的罪人，应对北京的陷落负责。夏允彝之子夏完淳撰《续幸存录》，不仅批评东林复社成员的政治活动、道德水平，甚至对其气节提出质疑，而为马

士英、阮大铖进行辩护。而林时对的《荷牖丛谈》更认为东林党中君子、小人杂陈，甚至小人多，君子少，以致国政日非，贻祸国君；东林诸君学术不明，义利不辨，导致东林党中为官多贪冒者。作者研究指出，降于明末清初，否定批评东林复社以致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像复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朱一是、柴绍炳反思“结社”即“结党”，将之与亡国联系起来，从根本上否定了文人结社的合理性。只有黄宗羲、侯方域等少数东林子弟为之辩拥，大多数人认为党争各方均应为明朝亡国负责，东林、复社一方更是不能原谅。而黄宗羲“崇祯皇帝所以亡国，是因为其没有完全信任东林”；“夏氏父子”之“和平调停”等主张，“概源于其学术不明”等观点，却合者寥寥。

王思俊将复社成员的政治反思中两种对立的观点交代清楚，分析深入，立论有据，虽未公开申明自己的意见，细读之后，可知她是倾向夏允彝父子之观点的，可成一家之言。

五是王思俊书稿之后附有《复社成员登科表》、《复社成员入清任官中第表》、《复社进士明代任官表》、《复社成员著述表》，虽不能说各表数据考订、信息采集皆准确无误，但制表一事，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是嘉惠学界的好事。遗憾的是，不知何故作者未制《复社成员抗清殉节表》。

作为王思俊的业内同行和指导教师，在祝贺这部书稿付梓行世的同时，不能不对书稿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提出个人的提议。

一是书稿第五章专讲明末清初学术流变和复社成员的学术实践。部分复社成员认为举业打乱了学术的正常发展，士人专习举业，不读书，导致士风乖张，针对知识阶层中束书不观，空谈性命，不知时务的风习，部分复社成员反对空谈性命，主张“行已有耻”“博学于文”的治学原则，倡导新的学风和经济之学。学术由“虚”转“实”是学术流变的大趋向。这一评定是不错的。但作者却未谈最早提倡经邦济世之实学，并亲自付诸实践编辑《明经世文编》的复社名士陈子龙和徐孚远的相关识见。陈子龙说：“俗儒是古非今，撷华而舍实。只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徐孚远讲：“今天下士大夫无不搜讨湘素，琢磨文笔，而於本朝故实，罕所措心。以故揆藻则有余，而应务则不足。语云‘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像这样精彩深刻批判虚矫学风，主张经邦济世实学，又随手可以拈来的资料却不被利用，乃遗憾也。

二是明朝因何灭亡？对此，书稿没有专门章节论述。但在一些篇章中涉及党争和社盟的影响时触及到这一问题。作者的基本看法是清人张鉴《冬青馆集》的主张“明以党争亡国，社盟实助之”。这么沉重的包袱加给复社士子是否有失公允，是否不堪重负呢？这是我想多说几句的冲动所在。复社成员，不是君主，不是重臣，绝大多数是明末在野之秀才，政治地位最高者也只是在朝的六七品下层官员，对时代变迁，明清鼎革不起决定作用，这是其一。作者指出“复社成员中，抗清殉节者、为遗民者、仕清为官者，均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就是说，若复社成员有680人，就有200多人抗清殉节，若复社成员有2000多人，就有800多人抗清殉节，若复社成员有3000多人，就有1000多人抗清殉节，设若明末社会的各阶层、各社会组织成员都能有三分之一人员抗清殉节，涌出百万、千万复社名士陈子龙、徐孚远、夏允彝、夏完淳、吴易、六狂生一流的抗清志士，明朝可能就不会亡于清，此其二。我以为“明以党争亡国，社盟实助之”似难成立。王恩俊以为如何？

信笔写来，是为《序》。

赵毅

2013年10月于大连

# 目 录

|                    |     |
|--------------------|-----|
| 总序                 | 001 |
| 序                  | 001 |
| 绪论                 | 001 |
| 第一章 明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文人结社 | 015 |
| 第一节 江南地区的特殊性及其辐射   | 015 |
| 第二节 晚明士人的名利追求及影响   | 025 |
| 第三节 明代文人结社的分期及特点   | 037 |
| 第二章 复社的兴起及活动       | 050 |
| 第一节 复社的兴起          | 050 |
| 第二节 复社的组织情况        | 061 |
| 第三节 复社的集会和选文       | 079 |
| 第三章 复社成员及社内关系      | 103 |
| 第一节 复社成员的地域分布      | 103 |
| 第二节 复社成员的家世        | 117 |
| 第三节 复社内部关系         | 136 |
| 第四章 复社与明清之际政治嬗变    | 151 |
| 第一节 复社与明清之际地方势力的消长 | 151 |
| 第二节 清初复社成员的活动      | 176 |
| 第三节 复社成员的政治反思      | 188 |
| 第五章 复社与明末清初学术流变    | 211 |
| 第一节 复社成员与举业        | 212 |

|                         |     |
|-------------------------|-----|
| 第二节 晚明学风与复社成员的学术趋向····· | 231 |
| 第三节 学术批判与复社成员的学术实践····· | 250 |
| 附表一 复社成员登科表·····        | 267 |
| 附表二 复社进士明代任官表·····      | 282 |
| 附表三 复社成员入清任官中第表·····    | 293 |
| 附表四 复社成员著述表·····        | 303 |
| 参考文献·····               | 343 |
| 后记·····                 | 351 |

## 绪 论

中国古代士人结社之风由来久矣，至明末臻于极盛。明末清初士人的社会性行为，大多是在社团背景下发生的，社团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士阶层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复社由当时江南地区若干著名文人社团合并而成，成员遍布全国各地，对明末清初的政局变化、学术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复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巅峰，其中的新异因素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近代性”的端倪，因此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梳理复社发展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中国古代渊远流长的文人结社传统，为复社的兴起提供了文化背景。古代文献中“社”的含义较为复杂，归纳起来有两种基本情况：与土地和土地神有关。<sup>1</sup>秦汉以后，社神因时代、地域各异而日渐具体化，<sup>2</sup>本地区的先贤达人是社神的基本来源，其嘉言懿行成为民间教化的重要内容。民间将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也称为“社”。<sup>3</sup>这种春祈秋报的习俗起源较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已有相关记载。<sup>4</sup>至明代，社会的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并逐渐定型为“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民间教化仪式。<sup>5</sup>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单位亦称“社”。<sup>6</sup>社作为一种乡村基层组织，一直沿续至明清。

具有共同特点的人所结成的团体：“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sup>7</sup>这类社大致可分为两类，即行业性团体和具有共同信仰或志趣的人所结成的团体。陈宝良

1.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又《礼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由此可知，社的本意是民间共同祭祀的土地之神，而“社”在古代文献中的其他含义也多由此意引申而来，如文献中常称国家、朝廷为社稷，或简称为“社”即属于此种情况。

2. 侯炯曾：《侯忠节公全集》卷十二，《持声社序》：“昔梁布有厚德于乡，燕齐间为社，号梁公社。石庆之家不言，而大化于国，为石相社。唐之崔鵬，人为立德星社。至耆英雄辅，如香山、洛下，亦以社称。由斯以观社，盖举国人有之，非特士而已也。盖将以企望德义，奖化风俗，非为艺文设也。”

3. 《古今类书纂要》：“社无定日，以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秋分后戊日为秋社。主神曰句芒。民俗以是时祭后土之神，以报岁功，名曰社会。春社燕来，秋社燕去。社神又名句龙。”

4. 参见宗懔：《荆楚岁时记》。

5. 参见嘉靖《仁和县志》卷七，《恤政》。

6.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据注，当时二十五家为一社。又据疏：“礼有里社，……以二十五为里，故知二十五家为社也。”因此，顾炎武总结道：“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

7. 同上。

先生认为行业性团体出现得较早，且与后世的“行会”颇为相似。<sup>1</sup>唐代民间结成的“社邑”，就由各色商行组成：如小绢行邑、白米行石经社、屠行邑等。<sup>2</sup>宋代，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诸如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青果行献时果社，另外尚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等。<sup>3</sup>这种习俗，至清犹存。如丰镇县的社祀，除“农民社”外，尚有“钱行社”。<sup>4</sup>清代，仍有商业各行以社相称之风，如康熙年间，扬州称茶肆为“紫云社”，称酒家为“青莲社”等。<sup>5</sup>

因志趣相投或信仰相同而结成的团体古已有之，晋之“莲社”，唐之香山社，及隋唐时期大量存在的佛社，均属此类。宋以后，此类社团更为常见：太学生有“茶会”；文人有诗社、文社；年老的士大夫间则有“耆英会”等怡老组织；讼棍有“业嘴社”。仅杭州一地，文人结西湖诗社、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奉佛之人结上天竺寺光明会、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茶汤会、西湖放生会等，民间则有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马社、清乐社等会社，种类繁多。<sup>6</sup>可见，结社已经遍布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从人群聚集的角度讲，“社”与“会”的含义比较接近。《论语·颜渊》云：“君子以文会友。”因此后人称在文人相聚、会文谈艺的基础上而结成的团体为“文会”或“文社”，“复社”即是此种意义上的文人社团。

诗文社是中国传统文人结社的基本形式，其渊源可追溯至汉代的梁园雅集。<sup>7</sup>至魏晋时期，王纲解纽，名教衰微，士大夫多崇尚老庄玄学，他们声气相通，结成小团体。这些小团体虽无“社”、“会”之名，却具后世文人结社集会之实，影响颇为深远。永和九年（353）暮春，王羲之与志同道合者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修禊事”，<sup>8</sup>参加者除王羲之外，还有孙丞公、谢胜等共计42人，其中27人赋诗，留下诗作，15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sup>9</sup>此次集会开文人集会、会文之风气，并以王羲之《兰亭序》名垂青史，而“兰亭修禊”也逐渐成为

1.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

2.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83—107页。

3.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社会》。

4. 光绪《丰镇县志》卷二，《风土》。

5.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三，《桥西录》。

6.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

7.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268页：梁园为汉梁孝王刘武所筑，为其游赏、宴宾之所，所在之地今已不可考。当时的名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皆为梁园雅集的座上客。《隋书·炀三子传》载虞世基《元德太子哀策》：“凤高楚殿，雅盛梁园。”明末的文人集团“几社”，也是“仿梁园邳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可见在后世文人雅士的心目中，梁园雅集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可视为诗文集会的首例。

8. “修禊事”是一种祓除疾病、祈求福祉的古老仪式。据《周礼》载：“女巫掌岁时，祓除疾病。禊者，洁也。”另据《全汉文》卷八九仲长统《昌言》：“于水上盥洁也”。已者，止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这种仪式，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举行，在晋时极为流行。

9. 王羲之：《临河叙》，《全晋文》卷二六。